

2/10

内江市文史资料
(一市一史)

内江市文史资料

选 辑

一九八四年 第 四 期

(总第19期)



19

政协内江市委员会编

内江市文史资料选辑

一九八四年 第四期 (总第19期)

目 录

内江孩子剧团(一).....温余波(1)

草莓的味道

——回忆在内江孩子剧团

.....杨敬贤(4)

《内江县志》源流.....邹作圣(10)

建国前内江商业概貌(一).....宋子麟(20)

甜城蜜饯.....黄江陵(28)

我经营糖坊、漏棚的回忆.....严茂修(35)

建国前裨镇的酒.....周声名(40)

内江河酒到川西坝为什么变香了?.....张益谦(42)

谈谈内江张玉兴祥绵烟铺老板的“生意经”.....阴钧陶(43)

质疑·更正

是“穀”，不是“声”.....杨继仁(45)

更正二则.....(46)

封面 裨木镇沱江铁桥.....肖景勋摄影

封三 张大千补书赵贞吉诗碑.....满延贵摄影

张大千条幅.....黄江陵供稿

封四 余彻(公孙长子)书扇.....黄江陵供稿

内江孩子剧团(一)

温 余 波

内江孩子剧团是怎样组织起来的？

这得从两次灾害说起。一九三八年春天，内江白马镇连续遭受了两次大灾害：一次空前的冰雹灾，冰弹子像鹅卵石，一般比鸡蛋还大，打死了农村很多牲畜，庄稼禾苗全部摧毁，镇上和乡间的瓦房，大都成了瓦砾堆；雹灾刚过，又是一场空前的火灾，烧毁街房三分之二，两千多灾民，露宿在焦土上，渴望政府救济。可是，官方人士说：“现在国难当头，要体谅政府苦衷，希望就地筹款解决。”因此，地方上的开明人士，在进步青年师生和职工的鼓动下，发起了一次“为救济灾民募捐游艺会”，演出歌舞戏剧节目。售票收入，全部捐助灾民。我当时在沱江中学读书，是学校开展文艺宣传的积极分子。李仲权老师通知我说：“你们白马庙，要开游艺会，为灾民募捐，这是慈善事业，学校准你几天假，回去参加吧！”我从此开始正式登上了戏剧舞台！

我参加救灾募捐演出以后，回学校不久，同学李小东交给我一封信。这封信是十几个小学生联名写给我的。信上说：他们已决心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宣传团体，推选我任团长。李小东建议取名为“内江孩子剧团”。我后来知道这是住在他们学校旁边的谢小韞和关圣殿的谢碧芳出的主意。这两位进步女青年，后来都入了党，和中共四川省委派来的吴汝翊同志，一起成了内江孩子剧团的组织领导人。这封信在学校传开了，同学们开玩笑叫我温团长。接着我便连续收到从成都寄来的《星芒报》——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车耀先领导创办的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

之后，谢碧芳约我爱人刘尚志在白马小学旁边谢小韞家里，讲述了上海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的事迹，并且动员我爱人鼓励，我发挥演剧天才，向上海孩子剧团学习。赶快组织起来干。谢碧芳要了一张我和我爱人的合影到成都去了一趟，大约在闰七月初回到内江，担任中共内江特别支部书记。

农历六月初十，“芦沟桥事变”一周年这天，学校放了暑假。在这之前，学校曾动员学生参加暑期宣传队，我早报了名。这天就随同内江中学生暑期宣传队一起，乘专车到了自贡。这个宣传队的队长，是内江学生生活社理事长张德生，到自贡地方，得不到支持，没法展开活动，第二天就解散了，连返途车都包不到，只好各走各。我和女同学王志洁一道，雇了两架人力车转回白马镇。我爱人刘尚志提醒我说：你不要忘了谢三姐（小韞）她们的话，再去跟随别人瞎跑，自己把剧团组织起来干。

六月十三那个逢场期，正当星期天，镇上来了十多个男女青年，其中有谢碧芳的妹妹谢薇若、吴汝翊的表妹钟宝珊，还有王竹村。他们对直到我家来，口称找温团长。要在白马镇场上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我很受激励，也很感惭愧，剧团还没组织起来，人家就真把我当团

长了！我只好热情接待，并约了十几个小学生随同那些哥哥姐姐们，一起走上街头宣传。事后钟宝珊就约我一路去乡下，说是到她表哥吴汝翊家去玩。

吴汝翊是一九三七年参加共产党的，准备去延安，奉省委指示，回内江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城里联络了一些进步教师，策划组织兴华剧社。为了策划组织孩子剧团，特意回到他的老家——距白马镇十多里的菜子湾吴家大院。是他派钟宝珊来约我的。我在那里住了两天。吴汝翊帮助我拟定了内江孩子剧团组织章程、决定召开成立大会日期，并拟定了宣誓的誓词：

“继承先烈遗志，打倒列强，振兴中华，唤起民众，共同奋斗。”

后来宣誓时，把“继承先烈遗志”改为了“继承总理遗志”，以下几句没有改。

组织章程按规定要送到县上备案，当时国民党县党部，指定把“内江孩子剧团”的名称改为“内江第四区孩子战时宣传团”。这是为了限制我们的活动范围。牌子虽然改了，大家还是按习惯叫“内江孩子剧团”；当时各家报刊发表的评介文章，也通称“内江孩子剧团”。我们的实际行动突破了官方的限制。

第二个星期天（阳历七月十七日）在我家里召开了一次预备会，并开始准备排练节目和演出装备。我把家里的一笼淡青胡绉帐子拆了改成天幕，又拿了四床被单拚成大幕。我们排练的节目，有陈白尘的《一个孩子的梦》，布景要一对石狮子，去请找染铺作。几位找扎匠听说是要成立剧团，演剧宣传抗日。异口同声地说：不要钱，愿意尽义务，帮助找扎并绘制全套布景，但是，有个条件：他们要参加我们孩子剧团作为超龄团员。我为他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立即表示欢迎。其中有一位是内江著名的民间艺术塑师段吉荣的徒弟刘岳。此人解放后任内江川剧团美工，现在资中川剧团。已退休。西林寺有他的作品，并在庙壁上留有书画和一篇《塑佛记》。

成立大会于八月四日在白马镇正中街六号（现在人民银行旧址）四楼上召开。共有三十多个团员参加。王竹村代表兴华剧社出席了大会。当天晚上，在镇上文昌宫万年台上，演出了《大义灭亲》、《一个孩子的梦》等剧，都是吴汝翊事先给我们的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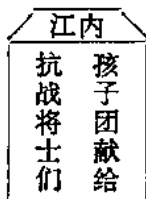
孩子剧团和兴华剧社，亲如一家，常在一起开展活动。有一次，白马镇柴市坝突然来了十多个难民，带着破烂行李，北方口音，说是从东北逃亡来的。难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日本鬼子奸淫烧杀抢劫的行为，吸引住好几百人围观。又唱起了《流亡三部曲》。观众们很受感动，自动丢钱。铜板、小钱、银毫子，一共收了十多元。最后大家才知道，这是内江兴华剧社和孩子剧团合作演出的街头剧《难民曲》。大家捐助的钱，全部交内江抗敌后援会，支援前方打鬼子。

当时，抗敌后援会又发出了为前方将士募寒衣的号召。吴汝翊给我们出主意，采用为灾民募捐的办法，义卖公演。并且教我们学会了一支新歌《募寒衣》，

秋风起，秋风凉，
民族战士上战场，
我们在后方，
多献几件棉衣裳。
帮助他们打胜仗，打胜仗，
收复失地保家乡。

逢场天，我们带上义演入场券，在街头人多的地方唱《募寒衣》，唱完后就推销入场

券，并且向群众宣传说：买义演入场券看戏，是国民爱国的表现。这次义买演出共三天，收入二百多元。吴汝翊代我们计划，做了一百多件棉背心，并刻了一颗长五寸、宽三寸，“内江孩子团献给抗敌将士们”十二个楷书字的木印（如图）盖在棉背心背面白布里子上。面子是灰棉布。只书“孩子团”三字是故意把官方规定名称简化的。



冯玉祥将军来内江为前方将士募寒衣时，在关圣殿大操场召开的民众大会上，特别表扬了内江孩子剧团“是教老百姓的小先生”。我们的小分队进入成都时，冯玉祥将军已于三天前到达成都。他听说我们住在四川大学。冯玉祥将军由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陪同，在川大图书馆前殿接见了我们。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吴汝翊是我家的常客，常在背后替我出谋划策。有一次，我们在文昌宫戏台演剧，那里是区公署，区长刁宏的舅子牛巡官，在戏台对面的正殿上“摆围鼓”，大锣大鼓和我们“唱对台戏”。我去当面指责那位巡官，说他破坏抗日宣传工作。那晓得：他根本不理睬，反而对那些“唱玩友”的说：“别管他，娃娃家，不跟他一般的见识。”锣鼓照样打。气得我没办法。吴汝翊悄悄告诉我：“把台上的人都混到观众中去鼓动，再去向观众说明情况，戏无法演了。”这办法真灵！观众中发出了怒吼声：“不准破坏抗日宣传！只有汉奸才怕抗日宣传。”那些唱围鼓的玩友，只好收起锣鼓，灰溜溜地散伙。我们终于胜利地演出了！

第二天，白马镇上的茶房酒肆都在议论这件事。有的说：“温家那个二娃子，人不大点，胆子还不小。一个娃娃头，敢在堂堂区公署，当着众人跟区长的大舅子牛巡官作对！硬是不怕事！”又有人说：“怕个屁！人家是团长，搞的是抗日宣传工作。现目下国难当头，破坏抗日宣传就是汉奸。你说哪个怕哪个？”

从此，我就成了白马镇上的“头面人物”！可是，吴汝翊同志却因此离开了我们。就在昨天晚上，戏还没完，吴汝翊就走了。说是他家里来人找他回去有事。临走时，特别叮咛我：要准备出去见见世面，别老守在自己家乡。现在上海孩子剧团在南方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我们最好北上。他们向南，我们向北，扩大抗日救亡宣传的影响。人多不行，就组织一个小分队拉出去。到了成都，自会有人帮助我们。进入成都之前，别忘了给《星芒报》社写信。

吴汝翊同志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离开了我们，去自贡担任《正确日报》（中共自贡中心市委领导的宣传刊物）的主编；由中共内江特别支部书记谢碧芳，和我爱人刘尚志联系，继续领导我们内江孩子剧团的活动。

我把组织小分队北上去成都的意见，同大家商量，表示愿意出去的人就有二十多个。经过和家庭、学校的仔细磋商，也是一次相当复杂的斗争。当时白马镇小学校长苏则韩多方阻挠，特支的同志作了很多思想工作，才争取到蔡明扬（十三岁）、张芳霖（十四岁）、张国祥（十六岁）、陈大宾（十岁）等几位男学生，参加巡回宣传活动。

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排练了一批小演唱节目，还画有四十幅全开冒泥纸的揭露日寇暴行的大幅漫画。于农历十月十七日开始往成都方向进发。沿途演唱，至冬月二十四（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到达成都。

临行前几天，特别支部把我们要北上宣传抗日的消息传到了沱江中学。李仲权老师把我叫到学校去，送了我一本厚厚的信笺，和一扎贴好邮票的信封。要我每到一个县城，或者每

一周，给他写一封信，详细报告我们的一切情况。我感到这是老师对我的关心，我欣然允诺。后来是照办了的。

出发之前，谢碧芳大姐代表中共内江特支送给我们每人一枚珍贵的礼物：银质帆船式的徽章。特别请银匠定做的。上面镌刻着“内江孩子剧团”字样。意思是鼓励我们，要象帆船那样，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临行时，兴华剧社整队欢送我们，到科始垌才分手。

我们穿着草黄色军装，背着被卷和斗笠，走上了北上宣传抗日救亡的征途！

一九八四年春节

草莓的味道

——回忆在内江孩子剧团

杨敬贤

一九三九年出版的一本《秦光银诗选》上有一首“献给内江孩子剧团”的诗写道：

有群小英雄，胆壮志又宏，
同行八人，一女七男童。

.....

这个“女”指的就是我。可惜这首诗我记不全了！另有一首成都名流张云伏“献给内江孩子剧团”的诗，是这样写的：

一队小英雄，高唱爱国曲。
徒步行千里，精神我不若。
有志不年高，年高多堕落。
但祝孩子们，努力救民族。

我不是内江人，家在仁寿县。我父亲叫杨潜深，原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混成旅少将旅长（解放后在重庆中苏友协工作，一九六二年病故于成都）。我在家养尊处优，呼奴使婢，人称三小姐，怎么会与内江的“小英雄”为伍呢？现在想起来，真有点“草莓的味道”！

抗日战争初期，我正在成都协进中学读书。协进中学是当时最进步的学校，公开宣传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救亡宣传鼓动提纲”，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实现全民抗战的方针，为独立自由而战。学校号召我们要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经常有几十个同学参加《星芒报》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每星期六晚就到报社去排练节目，星期日下午或是街头宣传。我在这些活动中深受教育，懂得了抗日救亡道理，那时在我的心坎上深深地播下爱国种子。我发誓不当亡国奴，要为抗日救国献出我的一分力量。

一九三八年冬天，星芒社的同志传来了“内江孩子剧团，从内江步行到成都宣传抗日”的消息。

前几天，听说上海孩子剧团收编了长沙儿童剧团，到了贵阳，在贵阳联合各学校举行了儿童歌咏大会。又由贵阳到了重庆。同学们真想见识见识。现在内江孩子剧团却先到成都来了，这可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同学们很关心，争相打听情况。接着便看到《华西日报》上登载题为《内江孩子剧团表演极受欢迎》的报导；《川康日报》上登载题为《内江孩子剧团访问记》的一大版特写。报上还特别注明他们的团龄：团长十五岁，最小团员才十岁。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听说他们住在四川大学，大家很想去登门拜访。真太巧，星芒社的同志把内江孩子剧团的同志领到我们学校来找女演员，并听说他们是到抗日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延安去的。这更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地方，当时有二十多个女同学申请要求参加，并填写了志愿书和登记表。我就毫不犹豫地履行了入团手续。

按组织规定：这个“志愿书”要有家长签名盖章，同学们和我一样，不仅不能去征求家长同意，而且根本不能让家长知道这件事，大家只好自想办法。我看到过我父亲那枚私章，与众不同，象一颗官印。找来一条大红萝卜削成正方形，用剪刀尖刻了我父亲的名字，盖在“志愿书”上。这在我们一伙人之间是个公开的秘密。

从这时起，内江孩子剧团在成都协进中学就发展了二十多名女团员，我们每天在一起学唱新歌，排练新剧，四川大学天明歌咏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特为我们教唱了一支新歌《祖国的孩子们》作内江孩子剧团的团歌。我现在还能唱这支歌：

起来吧，起来吧，
祖国的孩子们！
起来吧，起来吧，
殖民地被压迫的奴隶牛马！
划时代的一二九，
已掀起了民族革命的巨浪，
伟大的八一三，
已燃起了民族解放的火把！
我们不愿做羔羊，
我们不愿做羔羊，
我们要反抗，反抗，反抗！
到奴隶们能够自由抬头向上。
我们不愿做马牛，
我们不愿做马牛，
我们要战斗，战斗，战斗！
到胜利属于我们的时候。
我们臂挽着臂，手拉着手，
踏向真理的战场，
向着光明的路上走！
我们臂挽着臂，手拉着手，

踏向真理的战场，
向着光明的路上走！

记得当时我们协进中学的教师吴惜闻，特为孩子剧团导演了一个话剧《夜之歌》，由十五岁的团长温余波演逃犯，十二岁的蔡明扬演警察，十四岁的同学贺淑芬演逃犯的妹妹。

我们这群孩子，打着内江孩子剧团的旗帜，昼赴各乡宣传，夜在城市工作，颇为劳苦，一切费用全是四川大学赖自昌（内江人，后来才知是中共地下党员）经手发给。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华西日报》第七版刊登了一则消息：“商人义卖献金，第五日会场情形……本日游艺，初由协进中学学生表演爱国新剧，继由内江孩子剧团表演小英雄、莲花落、双簧、神秘弹子、联合力量等剧……”。

其实，这天大会的游艺安排，是早经成都市总商会聘请内江孩子剧团担任，我们协进中学学生也是以内江孩子剧团团员的身份参加演出的。由于我们多数同学原先参加过《星芒报》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被新闻记者认出是协进中学学生，所以样这报导。

我们在申请参加内江孩子剧团的时候，并不认为只参加剧团在成都的活动，而是下了决心要和剧团一道走的。可是，离成都的具体日子，却不知道，团长一直没有通知我们。腊月十一日中午，贺淑芬悄悄告诉我说：剧团明天就要出发离开成都北上，叫我赶快准备，一定要在晚饭后，带上行李到四川大学文学院宿舍留青院集合，并叫我“保密”。

晚上，我背起了被盖行李，最先到达指定地点。剧团的人都不在，川大文学院的学生廖竹立告诉我说：他们暂时不走，你明天来吧，我就把行李放在那里。谁知第二天我再到川大去已找不到人了！听说昨晚上有二十多个女孩子带着行李到那里去，准备和内江孩子剧团一道走。组织领导上看女孩子太多在路上会招惹是非，因而婉言谢绝。但这些女孩子死缠着不走，一定要宿在那里候着一道走。几位川大学生连夜到协进中学把训育主任和级任老师胡曼初等请来劝留。这批女学生爱国热情高涨，老师的道理说不过，又去把一些家长请来，有的家长哭哭啼啼也留不住自己的女儿。赖自昌才向大家宣布：组织决定，命令内江孩子剧团改变计划，停止北上，返回内江。新参加这批同志，留在成都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以后时机成熟，需要大家时再行通知。并劝大家要服从组织决定，这样才算平息了一场风波。

我恨自己失去了随团一路走的机会。当时我呆呆地站在那放背包的空无人影的寝室门口，痛苦地沉思、懊悔……，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才无可奈何地离去。

学校放了寒假。我从川大的同学那里打听到孩子剧团已回内江，很想立刻就追去。可是没有路费，只好回家另想办法，再等机会。

春节后，学校开学了，父亲将学杂费和伙食费共七十多元给了我。当晚我整夜不能入睡，就在考虑还是找孩子剧团呢？还是进校读书呢？徘徊不定。心想：我在家人称三小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优裕生活。如果去孩子剧团，那是终日忙碌，白天排练，夜晚演出，自己还得背起几十斤重的背包步行几十里，晚上还要工作，这样艰辛的跋涉我受得了吗？这时我的耳边响起了我们在宣传时唱的歌声：“敌人杀来，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个人安康？目前欢笑转眼变成凄凉，一切都化为灰烬！”要有国才有家。那被日寇轰炸燃烧后的残墙倒壁，和那血肉横飞四体不全的尸体的悲惨情景，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地呈现……。

最后决定还是找剧团去。我将学杂费和伙食费作路费，瞒着家庭和学校，到内江找孩子剧团。

到了内江一问：孩子剧团在白马镇。我找到剧团，全团五十多人，热烈地欢迎我这个远来的女同志，我好象见到自己家里的兄弟姐妹一样，感到很亲切。我住在团长温余波家。立即投入紧张的排练工作，准备又一次长途跋涉宣传抗日。大家把徒步上成都那次，称为第一次长征，这算是第二次长征了！

这次计划，是沿公路向重庆方向行动，到重庆待命。

报名参加这次长征的团员有三十多名，由于家庭和学校的阻挠，最后决定只有八个人参加，组成一支小分队。

一九三九年农历二月初的一个逢场天，我们在白马镇文昌宫戏台举行告别演出。我成了小分队唯一的女演员。可惜贺淑芬没有来（她是我们同学中最活泼大方的女孩子，在我离开成都之前，曾去找过她，没有见到，听说被家里管制起来了！）《夜之歌》一剧，我就接替了她扮演的角色。

小分队出发的前夕，我光荣地佩带上了中共内江地下党组织发给的银质帆船式徽章。

“内江孩子剧团”几个字，银光闪闪，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第二天，我们的小分队，打着“内江孩子剧团巡回宣传队”的旗帜，进入了内江县城，在衙门口鼓楼下面一家茶铺歇息，茶铺老板好象对我们很熟识，热情接待，安排了一个大房间给我们住。下午，街上出现了大幅海报：“内江孩子剧团今晚在南门大戏院表演精彩节目，不收门票，欢迎参观。”

这海报是谁贴的呢？我们团长都不知道。走到戏院一看，原来是个空场子，舞台也是空的，电灯都没有，这戏怎么演？大家颇感惶惑！

回到鼓楼茶铺时，么师交给我们团长一张纸条，说是有人来找过，留下的。大意是说：租赁了两架煤气灯，款已付，晚上点亮了送到戏院来。希作好演出准备。纸条后面的签名，谁也认不出是什么字。

晚上，我们在南门大戏院演出了仅有的一台节目：几支抗日救亡歌曲（包括团歌），几套小魔术——我们叫新型抗日魔术。这是去年冬天，孩子剧团在成都时，环球幻术学社社长、著名魔术大师傅润华传授的，魔术道具也是他送的。还有几段曲艺；压台戏就是独幕话剧《夜之歌》。我们剧团的美工刘岳，特地为这个戏画了一幅“砌末”式的城墙和一株大树。演出时，用绿色有光纸把煤气灯蒙上，布景还真不错，增强了戏剧效果，受到了观众的称赞。

本来我们还有三个拿手好戏：《最后一计》、《三江好》和《放下你的鞭子》，可是，这三个戏，我们剧团在内江早已演出多次，而且《鞭子》不宜舞台演出，前两个戏都没女角，只好暂时不演。

离开内江这天的早晨，来了一位教师模样的同志，领我们到南门外桃林茶园。那里坐满了内江各界的头面人物。听说蒙古沙王要经过内江，那些大人物都是去“候驾”的。正好，我们就在茶园张挂“战绩”（剪贴的各种报纸和题词锦旗），散发“宣言”，开展宣传演唱。

一位爱国人士提议说：为了支援内江孩子剧团跋涉远征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自愿乐

捐。倡议者带头捐助了一块大洋。响应者很踊跃，很元、毫子共收了三十多元。

从内江到隆昌，经过了四个乡镇，每个乡镇都住了一至二夜。逢场天在街头宣传，打炮戏就是《放下你的鞭子》。为了演得逼真，激起观众的愤怒情绪，我身上真挨了不少鞭子，流下了真正的眼泪！我们团长扮演卖艺老汉，演完后，他向我赔礼道歉，使我啼笑皆非！

在隆昌，住在民众教育馆，白天“逢街”，在南门桥演街头剧，晚上在庙台演出。临行前夜，一位军官来到我们的住地，很有礼貌地向我们说：他是驻军团部的副官。奉团长命令，特来邀请我们剧团，明天为全团官兵演两台戏，因为人多，场子坐不下，要分上、下午两次，才能坐完。谈到节目内容，他转达团长的意思说：我们演的戏，团长都亲自看过了，认为演得很好，很能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日情绪。可是，几个戏都是演的沦陷区的故事，对即将出征的“补充兵”启发不大。要求我们新编两台戏：一是演当兵好；二是演逃跑不好。

一个晚上要编两台戏还得排出来，古今中外也找不到这样的编导。我们只好坐下来，用大家的智慧，照题做文，忙了个通宵，集体编凑了一个故事：

青年农民王光明，中了签，将被征入伍，王老汉令其去姨父家躲避。表妹与王原有婚约，又正词严地责王不应该逃避兵役；如不应征，即解除婚约，并要出面检举。王无可奈何，假言去投军，实则远避异乡，伙同流氓抢劫，被警察抓住打得遍体鳞伤，丢入监狱，王因而气得神经失常，王光明成了傻子。王傻儿和匪徒一起绑赴刑场枪毙。（上本完）

执行枪决时，监斩官发现王傻儿是精神病人，按律无罪释放，傻儿流落街头，被抓壮丁送入军营当二等兵，开赴前线。傻儿所在的一个连，奉命死守某山要塞，日寇强攻，全连撤退，傻儿被留山口。日寇攻上山时，傻儿将山沟中一堆“风萝卜”抱起向敌投掷，其实是部队撤退时，弃置的手榴弹。日寇被打得落花流水，以为中了埋伏，即全部撤退。傻儿因此提升为连长，神经也恢复正常，王傻儿又成了王光明。荣归还乡，与表妹结婚。剧名就叫《光明之路》。

由我们团长编制场目提纲，安排角色，规定人物行动线。台词各人自己按行动要求即兴凑合。这样演戏等于集体化装讲故事。为了获得剧场效果，全剧用滑稽戏形式演出，我们团长演王傻儿，我扮演表妹。

这两台戏居然演得很成功，场内不断发出笑声和掌声。后来每到一处，都把《光明之路》作为打炮戏，还在海报上写道：“注意手掌拍肿，谨防牙齿笑落。”

戏完后，驻军团长赞不绝口，特设上等筵席招待，赠送锦旗一面，大洋二十元。

离开隆昌县城到石燕煤矿，参观了群山似的煤堆，和半机械化的矿井。在井口我们正遇上矿工们换班上来吃晚饭，有几个铁皮车斗从很深的洞下面上升，车斗里坐满了乌黑的赤裸裸的人。我刚看见还以为装的是装的大块煤炭，他眨眼睛我才认出是人。工人中也有很多十二、三岁的童工，他们常年累月的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辛勤换来的微薄工资还养活不了家口，煤矿真是人间地狱啊！

矿山的房屋尽是简陋棚屋，没有任何可以演剧的场所。矿工们听说我们是宣传抗日救亡的剧团，特为我们搭了舞台，在那里演了两台戏，然后才去石燕桥镇上演。

在荣昌县城和民众教育馆的宣传队一起工作了十多天。安富镇和邮亭铺几个大乡镇，也多住了几天，到永川县时，已是阳历五月。听说“五三”、“五四”重庆连续遭敌机轰炸得很厉害，是否去重庆？我们有些犹豫。在东高小学住了好几天，伙食钱也没有。我们团长把

大衣卖了，大家才得到饭吃。学校的老师们听说我们的经费用完了，发动全校师生自由捐助一些钱，我们硬着头皮，还是往重庆方向进发。

到了璧山县城，我们在街心亭上演出。我唱了一支《太行山》的歌，就惹下祸了，被县党部的书记长叫去审问。问我：

“你唱的歌是谁教的？”

“没有人教。”

“没人教你怎么唱得来的？”

“是我在学校读书时捡会的。”

“你在什么学校读书？”

“我在成都协进中学。”

“你们学校是哪个老师教的？”

“我们学校没有哪个教。是我听到很多同学唱要，我觉得好听就捡会了。”

他威胁地说：“放屁！你不说把你关起来。”

“真的没有教过，关起来还是说不出是谁教的。”

“你们剧团是谁领导的？”

“是我们团长温余波。”

“是哪里派来的？”

“是我们大家选的。”

“还有什么人？”

“只有我们八个人，另外没有什么人。”整整审问了大约半天的时间，问不出什么眉目来，不知怎样的，后来又把我放了。苦了我们的团长，就在县党部的门口焦急不安地等啦，望啦，又不准他进去，好容易才盼着我走出了县党部。

我们打听到重庆被敌机轰炸得不象样了，城里的人都疏散出城了。上海孩子剧团在重庆都分成了两个队，分别到川东和川南的各村镇演出。我们到重庆又有什么意思呢？因而才改道往铜梁县方向北上。

我们背着背包，穿过了一个狭长而幽深的峡谷，走了十多里都冷清清地，生怕突然从山岩上跳下什么坏人！大家一边走着，常常面面相觑，不敢吭声。真是提心吊胆！好不容易才走出峡口，都发了一身冷汗。正好，峡口有个温泉，浴池修得不错，管理人问明来意，拿出几条浴巾，打开栅门，欢迎我们下池洗了个舒适的温泉澡，大伙紧张的心情，忽而轻松愉快了！

到了虎峰场，一位军官把我们安置在场上一家大旅馆，热情招待，他是中央军校政治部派来的，请我们给军校学员演出。第二天，我们在一个纪念堂演了《光明之路》，又是大排筵宴酬劳，还送了锦旗。

到铜梁县城，我们住在一家旅馆里。第二天，铜梁县党部派来一位干事，接我们到县党部为我们安排吃住，并叫我们安心留下来，等待参加七月份中央军校校庆游艺大会。这段时间我们就在县属各乡镇巡回演出。县党部还派了铜梁县城关小学宣传队和我们配合一起工作。

这一宣传队有三十多个小学生，两位队长都是女孩子，一名张重华，一名濮凤章，都很活泼美丽，我们一起工作了一个月多，配合得很好。

在这一月多的工作中，可以说是我们长征以来最艰苦的一月多。正是酷热的夏天，每天

《内江县志》源流

邹作圣

光绪三十一年本《内江县志·序》说：“《内江县志》宋以前必有纪载之本，而今无见者，盖元初仇蜀兵燹之毒，千古所无，内江城地荒民散，历百年不可设官，志乘所以无片纸之传也。”这篇文章所说宋以前志乘有记载之本的判断是有道理的。查宋时地理总志，特别是南宋地理总志所记内江形胜、景物、古迹、碑记、人物等目都非常详细。如《舆地纪胜》记景物：“华蓥山，距内江十里，昔范崇凯于此读书，后赋《华蓥楼赋》，因以得名，山及泉均名华蓥，砚池犹存。”又如记安夷军地点，指出“在内江上流二十里太平坝，今名安汉坝”。又如载汉永建五年汉安修栈道记碑“在内江县界磨崖，字今已磨灭”等。如果没有类似方志的记述提供资料，一部总志要记得这么详细，是不可能的。

本来在隋代大业年间，就出现了由政府组织各地方编修方志，供中央政府编修总志的依据，所以隋代能够汇纂成《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当时方志是采取“图经”形式，以“图”为主，“经”是图的说明，是记注。唐代方志，仍继续沿用图经形式，并曾规定各州每三年修图经一次。北宋景德、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诏诸路、州、府、军、监普遍撰修图经，自此以后，图经特盛。所以我们现在还看到很多地理总志记事注明是引自图经的。

到了南宋，方志的表现形式，逐步过渡到以文字为主，增加了职官、人物、诗文、碑记、风俗等内容。方志开始从地理性质中分离出来，成为以文字记述为主的著述。南宋以后，内江可能有以文字记载为主的方志的。现旧《内江志》所记宋时人物，如记南宋时知县

我们都要下乡宣传演出，来回最少都是步行五六十里，早出晚归。工作再苦我们谁也没叫苦，而且一天到晚个个都是蹦蹦跳跳、嘻嘻笑笑地工作着。我们团的几个同志当然更不在话下。说实在的，我只是咬紧牙表面上高高兴兴，暗地里我却痛苦极了。这时候我已生病了，不过还能勉强支持工作，因而也没向我们团的同志中任何人谈，就这样把这一月多熬过了。到七月底，中央军委校庆游艺会开得很隆重，节目较多，我带病演出了《夜之歌》。这以后我就病倒了，再也不能工作了。

我们团不能在这里久住，要离开铜梁县。同志们一没钱，二没较大的力气，每人连自己的行李和道具都感到负担不了，怎么能拖着一个严重的病人长途跋涉呢？为此事大家都发愁，怎么办呢？幸好我有一个在协进中学同班的女同学是这里人，就决定把我留下住在她家养病。在这样贫病交加的情况下，只好迫使我痛苦难舍地离开了战斗近一年的战斗队——内江孩子剧团。后来因我离开了剧团，他们也无法再演出，也就不能北上，被迫回了内江。我一直未打听到剧团行踪的确切消息。从此，我就踏上了人生坎坷的道路。

一九八四年二月忆写于仁寿县龙马社中

（本文作者杨敬贤系仁寿县退休教师）

邓棐“绍兴初任。首修庠序，次讲兵农，利兴弊革，上下悦之。”又对南宋孝宗淳熙间县尉陈咸，记其“发奸均徭，出粟赈旱，修学政，积兵备，以遏金寇之攻。”旧《志》均注明出自“原志”，这个“原志”或即为宋时之《志》。

又光绪本《内江县志·祥异》载有“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秋七月地震”，“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秋八月岁大稔”等等，都注明出自“旧内江志”。这样久远的情况，由口头流传下来，到明朝时才有记载，是不可能的。

明代，内江县多次修《志》，是有记载的。永乐十六年（1418年）朝廷颁布修志条例二十一条，令各级地方官严格遵行。内江县也在永乐中（1418—1424年）创修志书。那时“唐宋名人显宦石刻：范公《华萼楼赋》、赵卫公神道碑之类尚存可录，以故考究精覈，记载详明”^①。可惜没有刊印，手稿后来也遗失了。

正统十二年（1447年）又曾继修，这次“专琴席者虽经继修，舛谬差池，阔略殊甚，观者病焉”^②。这个本子也可能没有刊印，所以也没有流传下来。以上两次纂修本因稿本遗失，连纂修者都不知道。

明宪宗成化十八年（1482年），湖南人进士陈铨来内江任知县。陈铨对修《志》一事，十分重视，“视篆之后，即欲踵成”，因这年遇到大旱灾，没有修成。待灾荒过去，就聘请邑人曾任过副使的吴玉和江西人教谕白璧主修。弘治三年（1490年）初稿刚定，还未刊印，陈铨调升侍御离了内江，继任的曾珉和再继任的刘廷策，对此不甚重视，所以“因循十载，若将有待”。到弘治十三年（1500年）淮安人胡奎继刘廷策后任内江知县。据吴玉说，此公“早领乡荐，雅重斯文”，又请吴玉出来继续完成定稿工作。吴玉“乃取前稿，再加校仇，两越月而成书”^③。这是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事。胡奎很重视，命匠氏“搯铁笔，录以传远”^④。这是第一次刊印的《内江县志》，可惜已找不到存本了。

弘治十五年到万历十一年（1573年）的八十年间，曾任礼部尚书的高公韶，曾任阁臣的赵贞吉，曾任武陵令的马升阶等，“或旧本有所批评，或家塾私有纪录”^⑤（如高公韶曾著有《邑志备遗》一稿），都有过续修的志愿并作了些准备，但都没有实现。到万历初，云南人进士出身的史旌贤来任知县。因为前次修志到此时已八十年了，“缙绅先生数言志废状”，史旌贤支持续修的倡议，“寻就故丞相书楼（即现内江市电影院地址）拓而新之”，设置专门修志机构，聘请进士出身，曾任过布政使当时退休在家的高察主修，又延“文学数辈，开局分曹，骈罗载籍，咨访父老，质勘异同；复移书荐绅先生诸长者，咸罄所睹，记书诸册。”^⑥据史旌贤说，这次资料搜集翔实，不象许多续志大部都是后抄前，他说“是举也，得之旧刻者什一，翔于编载者什九。”^⑦资料搜集完毕以后，由高察“提纲振目，稍为铨次，为卷者八，为纲者四，为目二十八”。编纂工作进行得很快，“始于癸未（1533

①、② 均见弘治本《内江县志》吴玉所作序

③ 以上引文均见吴玉《内江县志》序文

④ 见胡汉章（奎）《原志序》

⑤ 见万历本《内江县志》高察序文

⑥ 见万历本《内江县志》高察序文

⑦ 见万历本《内江县志》史旌贤序文

年)仲春辛亥,迄三月壬辰,凡四十日告成”。这本书进行得这么快,质量如何,可惜已见不到了。史旌贤说“方伯公(布政使相当于今省长职务,故称方伯)沉毅渊邃,好修博古,良史才也,其功当与《志》相终始云。”史旌贤以一个知县对一个曾经是布政使的人说话,有无谀词,就不知道了。不过高察所持的态度是可敬的。他说:“余鄙人也,述故事以论次之耳,非敢窃附于载笔之林也。然搜八十载里巷之遗韵,二百年疑信之典,不敢详浮言而略事实,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拓其未备,订其未公,尚俟后之君子。”

万历本未刊印,在天启元年(1621年)永宁宣抚司奢崇明叛乱,攻占内江,烧杀抢掠,弄得“百姓流离,行野蔽樗,里无烟火”^①,邑《志》也毁于火了。所以崇祯时知县雷应乾也说:“中川(内江别称)故有《志》也,考旧闻而亡其半,此何以故?则藺贼(即奢崇明)所为也。”^②因为前《志》被毁,到崇祯初,又已与前《志》成书时间相隔已五十年了,所以知县雷应乾又有补续前《志》的倡议。崇祯五年(1632年)二月书成。参加纂修的人有邑人曾任同知的高如崧,曾任知府的黄似华,曾任观察的杨所修,曾任太常卿的李应魁。高如崧、杨所修均有诗纪修《志》事。

明末清初,战乱频年,志乘湮灭。后来在康熙十九年平定吴三桂叛乱以后,要想查找旧《志》据以续修新志,哪知“遍览四方,竟无所获”^③。因为旧《志》未出,编纂新《志》,旧的部分没有依据,不得已把《四川通志》中有关内江县的记载,搜缀成编。据当时为《志》作序的成都府尹佟世醮说:“内江旧《志》遭兵燹,散佚不复存。徐令(知县徐嘉霖)访辑甚苦,大抵纪载不过什之一二耳。”^④以后嘉庆四年本张揆在序文中也说此本“简略不足观”。据康熙本序文说,《志》本还要“汇进御览”,可见清朝统治者对方志的重视程度了。后来又付印了,这就是康熙时纂修的二卷本。参加这次纂修的有曾任通判的何思华,曾任陕西成县知县的杨注。成书的时间为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此本省内仅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存有胶卷。

康熙本最简略,是因为失去了旧《志》的凭藉;其实,崇祯本还幸存着。原来在崇祯五年《志》本“告竣时,雷公(雷应乾)于在事诸人各授其一”。参加修《志》的杨所修正好得到一部。甲申前后,杨所修时侨居金陵,将所藏崇祯抄本交给他的儿子、后来曾任山西汾阳知县的杨拭,并告诫说,“此吾邑文献所系,汝其守之勿失”。后来杨拭隐退后仍侨居金陵,“取邑《志》旧本手加编续。”^⑤并打算刻印,未成。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内江人喻宏林任江苏六合知县,时宏林与杨拭的三儿、时任江南知县的杨化光是同僚,并且是同乡,常有往来,由此杨拭认识了喻宏林的父亲喻化一,因谈及邑《志》的抄本的事。喻化一听说旧《志》抄本尚存,“亟欲借观,其志殷然,盖不第一览已也,欲将梓以行世焉。”杨拭命杨化光弟兄抄写一部送给喻化一^⑥。后来因故没有刊印。喻化一的女婿龙桥里庠生王赐

① 见《内江县志·署篆马公生祠碑序》

② 雷应乾崇祯《内江县志·序》

③ 康熙本杨注《邑志跋》

④ 康熙本《续增原序》

⑤ 《内江县志·杨拭传》

⑥ 《邑人杨拭藏志序》

履看到这部手抄本后，带回内江^①，“分抄四部，各六卷”^②。据王果《志要》记其分抄者除王赐履外，还有庠生王赐晋、监生王宽（克仁）、监生门朱（象南）。旧《志》以此得在龙桥里王家继续保存下来，但康熙修《志》时还未发现这个抄本。

雍正时，诏令各省重修通志，上诸史馆，以备《大清一统志》采择，以后又令各州县每六十年一修，于是各省、府、州、县积极行动起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韩莱曾来任知县，因“询旧《志》，王文安澈乃于楼笥拣出”^③。后来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知县李恩书来任，也曾“闻而取观，议纂未成”^④。乾隆末，知县张摺来任，以“邑为省冲，故称名盛，凡宪旌上下及僚友宾客过境，接见之余，每询及邑乘，予愧无以对”，而康熙本又“简略不足观”^⑤。时家藏有明崇祯手抄本的龙桥里王果（王赐履为王果伯祖公）刚好乡试及第，张摺乃命王果协助刘一衡、谈熊就崇祯本续修梓行。这就是嘉庆四年本的由来。这个版本已不见藏本了。

嘉庆四年本印数不多，到嘉庆十年（1805年）徐丰来任知县，徐“锐情文献，雅意表彰，以存贮无书，亟欲增印”（实际是增补）。因王果曾参加前次的纂修工作，这时王果已于嘉庆七年（1802年）举进士，算是地方的名人了。徐丰于是委王果以增修之责。“乃为按类续编，并改从前之讹误”，“此又斯志所以由续修而印刷之”的原委^⑥。是本成书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四月。此版本也不见有藏本了。

现在四川省中心图书馆编的《四川省地方志联合目录》辑录的《内江县志》嘉庆本，不是张摺的嘉庆四年本，也不是徐丰的嘉庆十二年本，而是顾文曜主持（顾为嘉庆十四年来任的知县）、罗文黻纂修的稿本（四川省图书馆藏有稿本胶卷）。据旧《志》《政绩》罗文黻传说：嘉庆“十七年因重修《四川通志》，县令顾文曜奉文采访”，请教谕罗文黻主笔。这样嘉庆四年到嘉庆十七年的十三年时间内就连续官修三次县志。这样短的时间内连修三次恐怕在修志史上也是少见的。还有，在顾文曜《志》后十五年时间，道光七年（1827年）知县张元澧又主持续修一次，由王丹、张松龄、刘景叔等纂修刊印。这个《志》本王果本来没参加任何工作，但把他列为“监修”，而此《志》又“参错杂增，殊乖整肃”，因此他很有意见。张元澧也盛到此本搞得太草率，“先生（指张元澧）病之，每公见，必以为言，且促余更辑。”^⑦这个本子大概因赶时间，又没有抓质量，编纂人员的责任心又差，所以弄得大家都不满意。这个本子已不见藏本。

王果对修志有自己的见解。还在他参加嘉庆四年本纂修工作以后，随着进士及第踏上仕途，又不断涉猎书史，阅历日多，对修志体例，有了进一步认识，“方拟人事稍闲，窃仿古志以土地、人民、政事、文献，辑《中川志要》一书，成一家言”，谁知“缮稿未竣”，知县徐丰就请他补续前《志》。因为徐丰“亟欲增印”，当然不可能细细推敲，实现夙愿。所

①④ 王果：《内江邑志·原跋》

② 王果《抄旧志姓氏》

③ 《中川志源流》

⑤ 张摺：嘉庆四年本序

⑥ 王果：《内江邑志·原跋》

⑦ 王果：《内江县志要·序》

以嘉庆十二年本完成以后，“居常脉脉。每念志体拘于常格，繁衍多而位置适宜，思参酌古志以稍稍见异”，但是“浮宦奔驰，因以未遂。”后来在道光七年又遇到几个责任心不强的人续修了一部以他为监修的名义刊行的《县志》，他更感到《县志》有重行整理的必要。道光十二、三年（1832、1833年）县里重建学宫，王果捐了白银三百两。董首的人“以续刊杂芜，属余就捐另梓”。要王果将就所捐三百两银子作刊刻印刷费重修《县志》，于是王果答应了^①。这是王果第三次纂修《县志》工作。但这次王果是私家修《志》，“罔邑绅耆，分文未假”，他“无索米之嫌，无投桃之报”，“兢兢加辑”，秉笔直书。他说：“志者史之余，不遗不滥，斯为传信，操笔者苟以文字媚人，则全书皆秽矣。”^②王果确实是认真的，他的修志实践和后人对他的评价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体例上，他“参酌康对山、王美陂武功、朝义两志而折衷于王、卢氏《巴志》之体裁”，并“悉发群书，更加搜核”，“以土地、人民、政事、文献分部其目，各以类从”。康对山的《武功志》和王美陂的《朝义志》颇能提纲挈领，但失之简略，《巴郡志》分目详细而又缺于条理。王果取二者之长，以土地、人民、政事、文献为纲，分部其目，各目归纲。他对这样的体例是很满意的。他说，这样来定目，“如网有纲，如珠有贯。纲举目张，则无疏冗之虞，贯累珠联，于瑕疵庶几哉”。^③又说：这样处理，有条不紊，不重不漏，“事多于前，文简于昔”。总之，他认为这样写要言不烦，名为《内江县志要》。成书时间是道光十四年（1834年），时王果年七十。这个刊本今已不见藏本。

光绪时知县罗度评此本“体例简明，目张纲举，开卷秩然”。光绪末续修者曾庆昌评为“采集记传，颇可观”。

王果《志要》以“土地、人民、政事、文献”为纲，是“仿古志”体例。万历本高察序中也说该本“为纲者四，为目二十八”。这两个本于的纲可能都是相同的，都来源于康对山的《武功志》。^④

又过十年，因为前《志》由私人印刷，由于经费关系，“印刷未多，未能普给”，十年以来，也有许多可增的内容，所以又有道光二十四年《志要》的续本，道光二十五年刊印。这个版本现省内仅四川大学有全书，重庆图书馆存残卷的卷一、二上。光绪十三年知县罗度认为此本颇有优点，对已“残缺失次”之版，重加排比，补刻完好印行。这就是光绪丙戌补镌的尊经阁版。此本现四川大学、四川省图书馆有藏本。

咸丰五年（1855年），知县许延祐来任，他不承认王果私人两次修的《志要》，他只承认道光七年（1827年）知县张元澧续修的本于。如果从道光七年算起，到此已快三十年了。^⑤到咸丰八年（1858年）延聘掌教华萼书院的岁贡黄德仁续纂。经过六个月的编纂，到九月完稿，同年刻印。此本现省内仅重庆图书馆有藏本。

咸丰本刻印刷过十年，《县志》又续修一次。这次续修的原因，据主修者道光举人、华

① 王果：《续修内江县志要启》

②③ 王果：《内江县志要·序》

④ 康对山是明弘治十五年状元，前于高察数十年。

⑤ 许于咸丰八年（1858年）咸书时为序说：“《内志》之修自道光丁亥（1827年）迄今越三十二载”。

尊书院主讲黄觉说，同治八年（1869年）知县张兆兰来任，这时太平军已失败，石达开于同治二年（1863年）被杀害，从云南打入四川的李永和、兰朝鼎弟兄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被打下去，清王朝统治者兴高采烈，慈禧太后“颁诏采访节义，以隆旌恤之典”，省里的总督，也承意饬令增修，以彰“节烈”。据黄觉在《续修内江县志序》里说，当时“薪水一切，无款可筹”，还是由张兆兰“捐廉支給”的。从同治九年（1870年）三月开始，到五月张兆兰就调任了。张兆兰离任时，虽然《志》书未成，还是写了一个《序》。继任的知县沈起骏初来时，修《志》工作，因经费无着，便停了下来。到年终因为接粮加派补修城墙的余钱，还有二百余串，同“邑绅酌商”，“准作修《志》公费”。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黄觉等又继续工作，到年底完稿刊行。^①此本现省内仅四川大学有藏本。

光绪元年（1875年）陆为葵来任知县。他对同治本《县志》不满意，认为“前《志》多讹舛”，对于在与云南义军作战中被打死的所谓“忠义节烈死事者，邑《志》多未补入”，他简直认为《县志》“中间辍修垂廿载”（从咸丰本完稿到那时近二十年），对同治本不予承认。于是在光绪二年（1876年）聘请咸丰举人陈功亮主笔续修。刚开始不久，陆为葵就调离了内江，工作便停下来了。到光绪八年（1882年），知县徐思温来任，又复请光绪乙亥科举人熊玉华续任主笔，徐去任，继任的赵焕又继续支持这项工作，到光绪九年（1883年）陆为葵又调回内江。恰巧在陆为葵回任时，《县志》刚好完成。熊玉华这次主笔特别对四川总督丁宝桢令裁夫马局一事十分称道。陆为葵说他是“留心经世”^②的人。他自己也说，自从黄觉主修的同治本以后，有好些项目都须增加，“而谓《志》之尤宜扬厉者，莫如制宪丁裁撤夫马局一事”。^③是本于光绪九年成书并刻印。省内仅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有藏本。此书系内江小西街树德斋梓人徐炳兰刊刻。

有一个对有关内江县历史文献记载颇为留心，并作了许多摘记，有心把所搜集到的资料补入志乘的人。这个人叫曾庆昌。他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举人。曾经任过翠屏书院主讲的门彦藻说曾庆昌“博闻强识，经传子史而外，百家杂记，稗官野乘，罔弗涉猎，尤留心乡土故实。”光绪三十年（1904年），曾庆昌主讲于花萼书院，这时彭泰士已第三次复任内江知县，可能彭泰士感到多次来内，想在内江留下点什么，加上曾庆昌的鼓吹，于是《县志》在光绪九年续修之后，只二十一年又续修了。曾庆昌说“贤侯彭公再回邑任政事，本于文学采风，念及《志》书，特委昌、举人朱襄虞，拔贡康树滋分纂。”^④这样曾庆昌就把平素搜集到的资料和一些考订增续进去。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书并刻印。这就是光绪三十一年续修本产生的原由。这个本子省内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和泸州图书馆有藏本。

光绪三十一年本是花了很多功夫的，从该本“凡例”中可以看到这点。现摘录于下，以见其概略：

一曰增：当载而（前《志》）遗者

二曰续：后《志》不及载者

① 同治本黄觉：《续修内江县志序》。

② 光绪九年本陆为葵序。

③ 光绪九年本熊玉华序。

④ 曾庆昌《增续内江县志序》。